

明清山东运河之水“柜”中来

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北上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3月3日起在央视一套播出。《北上》是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代表作,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“秘史”。运河流淌,贯通古今,而大运河山东段地处中枢区段,作为“咽喉要道”尤为关键,其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繁荣。

□刘永加

雨水节气已过,天气回暖,降水量逐渐增加,特别是3月2日,山东多地迎来降雪天气,带来了大量降水。这对于春耕来说,无疑是个好消息。而追溯至明清时期,完全依赖外来水源的山东运河,更是需雨水的补给,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水柜。可以说,山东运河之水就是水柜中来的。

五湖者,水之柜也

明清京杭运河的贯通,促进了南北之间各方面的交流。其中鲁运河又称“会通河”或“闸河”,即山东运河,位于京杭运河中段,长约600公里,北系京师,南控江淮,为漕运之咽喉,是我国南北主要水道。

由于山东四季分明,再加上降水少,季节又不平均,致使山东运河水源不足,难以保证河道水量,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。为解决这一问题,除大量疏浚泉源以外,还在山东沿运河设置水柜以调节水量。“运道有源,疏浚是亟。顾水之为物,恒雨则溢,恒阳则干,伏秋常有余,春夏常不足,蓄盈济绌,此水柜之所由设也。”《乾隆兗州府志》中的这段话就说明了山东运河设水柜的原因。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也指出了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意义:“运艘全赖于漕渠,而漕渠每资于水柜,五湖者,水之柜也。”

虽然山东降水少,但山东运河沿线湖泊繁多,这些湖泊可以通过水闸与运河贯通,成为调节运河水源的重要水库,以改变运河水源分布不均的困境。《清通鉴》卷九十二说:“山东运河之水,全赖诸湖渟蓄,以资灌注,所以前人有水柜之名。”正像清代治河名臣靳辅《治河方略》中所说,这些水柜“溢则减河以入湖,涸则放湖以入河”,对山东运河的水源补给作用巨大。

在明代,山东运河沿线湖泊有“水柜”与“水壑”之分,运河之东诸湖称“水柜”,运河之西诸湖称“水壑”。山东诸泉及诸河多位于运河东侧的州县,河流需先经过诸湖再入运河,运河东侧的湖具有蓄水济运的功能,而运河西侧的湖则不能受泉河之水,无此功能。

明永乐年间,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浚会通河,为解决水源匮乏问题,就把安山、南旺、马场、昭阳四湖作为四大水柜,蓄水济运,保障了漕运畅通北上。其中,明代政府很重视对安山湖的管理。正统三年(1438),东平州知州傅霖奏曰:“置减水闸于河岸,其三十八里,四面筑堤,水涨则泄漕水入湖,水涸则出湖水入漕,谓之水柜。”安山湖最初又被称为“积水湖”,《明一统志》记载:“积水湖,在东平州西十五里,会通河之南,周围百余里,四面有堤,

正统三年于近河处置减水闸。”嘉靖《山东通志》也记载:“积水湖:在东平州城西十八里,四面有堤,萦回百里,正统三年置减水闸,节水之出入,接济运河。”

除四大水柜以外,沿线还有马踏、蜀山、苏鲁、南阳、独山、赤山、吕孟、武家、张王等湖,据其位置及济运范围覆盖,济宁以南的独山、微山、昭阳、吕孟等湖,主要补给济宁以南的运河;济宁以北的安山、南旺、马踏、蜀山、马场等湖,主要补给济宁以北的运河。

到了清代,仍然延续明代的做法,继续设置水柜为山东运河补给水源。清代用于调蓄山东运河水量的湖泊,济宁以北主要有安山、南旺、蜀山、马踏、马场等五湖,由明代的四个主要水柜,变成了五个主要水柜。

河道官员管理水柜

山东运河水柜的运作原理非常简单,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,“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,水涸则放水入河,各建闸坝,以时启闭。”“漕河水涨,听其溢而潴之湖;漕河水消,决其蓄而注之漕。”让运河始终保持通船的水位,确保漕运之路畅通无阻。

在《两河清汇》一书中,对明代四水柜的管理运作也有过概括:南旺与安山二湖遇运河水位上涨时,开通各个斗门,使水入湖,这样可以减少运河水势保全运堤,同时可以避免泥沙沉淀淤积河道。蜀山、马踏二湖,水位上涨时,筑坝拦截汶河之水,使水分别流入两湖,疏浚后仍打开汶河使南北流通;遇到天旱水少,南北两湖放水济运。马场湖,遇天旱水微,通过启闭安居等水门调节运河水位……以上各湖蓄水或杀水皆听由河官管理,以济运道。四水柜的基本运作原理基本一致,其作用均为调节运河水量。

正是由于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性,在明清时期,加强了对其管理。虽然当时水柜不设专官管理,也没有专门管理机构,但一般由相应河段的河道官管理,力度非常大。明清两代,在湖泊、湖塘所在设有额定的湖夫、塘夫,从事巡守,以防止盗引湖水并进行疏浚。为确保水源安全,朝廷还颁发法令,严禁私自盗决湖塘引水。明成化七年令:“凡故决南旺、昭阳湖堤岸者,为首之人发充军。军人发边卫。”

清乾隆时,山东运河河道划分为四段,分别由四名河道官员管理,水柜由所处河段的河道官员管理:泇河厅河道,“由江南下邳梁王城至黄林庄入山东峰县境,为兗州府泇河厅通判所辖,其地当运入境首程,事务颇繁,兼以一湖泄事事宜,经理不易”;运河厅河道,管“山东全省运河之上流,其水则汶、泗、沂、澧,其泄则蜀山、南旺、马踏、马场、南阳、独山、微山、昭

阳诸湖”。

严禁盗决水柜及临运大堤

明清时期,运河漕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自上到下也都形成共识,一切都要为保障运河畅通无阻而让行。

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,为了保障水柜蓄水济运,运河补给优先用水,当时,在运河上修建水闸控制水源。据《明会典》记载,京杭运河上共有水闸80余座。水闸分为两类,一类是修建在正河上的“船闸”,即拦河闸,也叫“斗门”,其功能是调节运河河道中的水量,供船只通行;另一类是建造在运河堤岸上的水闸,又有减水闸和积水闸之分,用于排泄运河洪水的叫减水闸,而收纳济运水源的叫积水闸。

清朝廷还明确规定,山东、河南、直隶等地河流湖泉,要优先保障运河用水,不得随意灌溉农田。

清顺治十七年春夏之交,由于天气亢旱,卫水微弱,运河梗阻浅涩,于是河臣修筑堤堰,以便漳河全部入卫济运,这样就阻塞了漳河灌溉民田之水。

清康熙五年,漕运粮船北行处处阻浅,因当时安山湖、马踏湖周边靠近湖泉的土地多被周边居民耕种所致,他们或阻塞水流,不使湖泉进入运河,或盗决河岸,使湖泉只能灌田而不能济运,以致水柜水量日益减少,济运水源日益阻塞,漕船自然就受阻。因此,漕运总督林起龙上疏朝廷,请求朝廷敕令河道总督亲自勘察实情,予以处理,“诸湖曾否收水,水柜果否成田,柜闸有无堵塞,子堤曾否修筑,斗门是否填闭,堤岸有无废缺,诸泉果否开浚,务期浚泉清湖,深通河道。”

为此,清廷专门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,严禁民人盗决水柜及临运大堤。嘉庆年间更是规定:“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,沛县昭阳湖、蜀山湖、安山积水湖,扬州高宝湖,淮安高家堰、柳浦湾及徐邳上下滨海一带各堤岸,并河南、山东临河大堤,及盗决格月等堤,如但经故盗决,尚未过水者,首犯先于工次枷号一月,发边远充军。其已经过水,尚未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,首犯枷号两月,发极边烟瘴充军。既经过水,又复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,首犯枷号三月,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。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,有干漕河禁例,军民俱发近边充军。闸官人等,用草卷阁闸板,盗泄水利,串同取财,犯徒罪以上,亦发近边充军。”

为了漕运畅通,清廷对山东大小河流湖泉的管理极为严格,任何有碍运河补给的事都坚决制止,不许农民在河湖附近种植芦苇、藕以及捕鱼等。

断不能视田禾枯槁置之不问

我国是农业大国,而兴修水利、引水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所在。明代四水柜、清代五水柜的设立,的确是保障了山东运河的水源,却严重影响了沿线百姓的农业生产与灌溉。其中最突出的是微山湖一带,微山湖位于山东、江苏之间,是非常重要的济运水柜,湖口设有志桩(刻上尺度的木桩,用以测量水位之高低),按照向来定制,收蓄湖水高度一丈二尺,即足够漕运需水之用。但漕运是动关国计的大事,清廷对误漕官员的处分极重,所以河臣为了保证济运,防患于未然,往往在水柜中蓄水时超过朝廷规定蓄水高度,造成微山湖的湖面迅速扩大,大片农田被淹没,水患屡屡发生。

清康熙年间,微山湖面积还只有周围百余里,到乾隆年间已经扩大到280余里。等到了嘉庆二十一年,由于泥沙淤垫湖底增高,河督吴璥、李亨特上奏请求修改定制,收水高度一丈三尺以上。但事实上,泇河厅收水往往在一丈四尺以上,甚至将微山湖水收蓄达一丈七八尺,使周边数州县的农田也都沉入水底。

晚清时期的经世派思想家魏源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:“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,例蓄水丈有一尺,后加至丈有四尺,河员惟恐误运,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,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。而遇旱需水之年,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,涓滴不容灌溉。是以山东之水,惟许害民,不许利民,旱则益旱,涝则益涝,人事实然,天则何咎!”

在运河补给与灌田用水屡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,清康熙三十年,朝廷不得不规定,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,每年三月初至五月末堵塞涵洞,使河泉汇入卫河济漕,但仍留余水灌田;若是亢旱之年,则三日放水济运,一日塞口灌田。

道光二十年,山东运河浅涸少水,河督文冲上奏说:“卫河需水之际,正民田待溉之时,民以食为天,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,置之不问。嗣后如雨泽愆期,卫河微弱,船行稍迟,毋庸变通旧章。倘天时亢旱,粮船阻滞日久,是漕运尤重于民田,应暂闭民渠民闸,以利漕运。”朝廷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,也就是说在雨水微少但没有影响漕运通行的情形下,朝廷不能坐视庄稼枯死,不需要变更三日济运、一日灌田的旧例;如果天气亢旱过久,虽然农田急需灌溉,但漕运畅通、首都供应重于民田,则要关闭民渠民闸,以保障全部水源用于运河补给。

明清时期,山东运河设立水柜济运,保障了漕运的顺利进行,同时山东运河沿线百姓也为此做出了无私的贡献。

(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、文史学者)